

走自己的路

——谢本书史论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云南民族学院资助出版·

走自己的路

——谢本书史论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自己的路：谢本书史论集 / 谢本书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5

ISBN 7-221-05430-4

I. 走... II. 谢... III. 史学—研究—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859 号

走自己的路——谢本书史论集

责任编辑：曹维琼

开本：850×1168 1 / 16

封面设计：石俊生

字数：250 千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张：12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制者：贵州社科院劳司印刷厂

印数：1~1000 册

ISBN 7-221-05430-4 / K·566 定价：25.00 元

在平素交往而又比较年轻的朋友中，谢本书教授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历史学者。这从他常用“治学者，自学也”和“人才者，成果也”这两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他4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先后出版了40部著作（含合著及个人专著）、发表了约500篇文章，约800余万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谢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国西南地区史特别是云南近现代史等。他为什么选择西南和云南作为研究重点呢？这不仅由于这一领域在我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向比较薄弱甚至空白，更重要的是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的前8年中，由云南发轫的护国起义以及南方军阀的崛起等，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在抗日战争的后8年中，云南又是大后方的民主堡垒，由此引发的“一二·一”和“七·一五”学生爱国斗争，成为国民党区域民主运动的“标志”。可以说，护国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而“一二·一”则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继续。它们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谢本书对护国运动史、西南军阀史与地方实力派研究、史学理论的一些专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该领域具开拓性的首创之作。

以护国运动史的研究而言，谢本书在大陆和台湾主持出版了两本护国运动史的专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认为，以反对袁世凯帝制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

续，是又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护国运动的发动者是谁，众说纷纭，谢本书通过深入探讨，提出了“联合发动说”，即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蔡锷、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联合发动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与此同时，谢本书对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护国运动的历史特点、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诸问题，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西南军阀史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研究方面，谢本书的研究成果弥补了近代中国史研究在这个方面的薄弱环节和一些空白点。谢本书、冯祖貽共同主编 100 万字的《西南军阀史》三卷本，是迄今为止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著作。谢本书在这部巨著的“前言”及其有关论文中，对西南军阀的概念、特征、西南军阀史的分期、西南军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诸问题，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为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他认为，西南军阀史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1916 年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各省区，主要是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 6 省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若干派系的地方军阀。由于它们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而所在省区又基本上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因而称为西南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北方军阀）。西南军阀在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又使这 6 个省区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并力图向四川发展；桂系陆荣廷控制了广西、广东，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台湾学者林能士教授也指出，“西南军阀史”是中国大陆学者近二十年来新兴的研究成果。

随着西南军阀史研究的深入，谢本书又提出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概念。与牛鸿宾合作了有关专著，并写下了多篇论文加以阐述。谢本书认为，“地方实力派”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严格地讲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其特点一要有地盘，二要有实力。而西南地方实力派是指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未沦陷或未完全沦陷地区的实力派，大体上包括今天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区。这6个省区与历史上“西南军阀”的势力范围相吻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南军阀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前身。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其历史地位却大不相同，这个论述是颇为新颖的。

在史学理论方面，谢本书不仅参与主编了我国解放后的第一部史学概论教材，《红旗》杂志评论文章称为有“首倡之功”。他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如把史学的功能概括为“四性”，即规律性、知识性、借鉴性和凝聚性；指出史学的改革应当重视自然科学方法的注入，包括微观与宏观、定量与定性、纵向与横向研究的结合。对于爱国主义的特征，谢本书也提出了“四性”，即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和层次性。这些观点和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谢本书不仅阐述了历史人物评价的意义，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应以阶级、时代、发展、功过四点为评准，并着眼于今天的高度、动机与效果和个人与群众三点要求。他还倡导建立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历史人物学”，而且身体力行，写下了8本人物传记。其中蔡锷、龙云、张冲、李根源、艾思奇的传记著作，尤其得到好评，因而有人称他为“历史人物传记作家”。

在云南近现代史、云南民族问题等专题方面，谢本书的研究也颇为人瞩目。他主持编写了《云南近代史》，对云南近代历史

发展的基本线索、特点、三次革命高潮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框架性的意见，为云南近现代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云南近代史的若干专题，如云南抗战史、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史诸问题，都下了相当的功夫，把云南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多民族的云南，研究地方史，不能不涉及民族史和民族问题，谢本书在这方面也下了一定功夫，并曾主编《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不同类型民族地区分类指导研究》等著作。

应该说，谢本书教授在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今天，他把自己有代表性的论文汇集在一起，命名为《走自己的路》，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取得学术成就的。

1972年我重返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结识谢本书同志。1975年他到北京《历史研究》杂志社任编辑，我作为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主编，我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78年我们共同出席在武汉召开的教育部文科会议，同到北京，一度相约访问黎澍先生。1980年张冲去世，中央通知云南省写悼词，省委派我起草到京交稿。当时不少同志希望我写《张冲传》。我因年事较高，极力推荐谢本书作撰写人，并为此约他访问张冲遗孀惠国芳同志。1992年，我推荐谢本书继续担任云南史学会会长。这期间我们见面机会虽不多，但交情是不错的。1994年谢本书调任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同住一楼，在学术上交换意见的机会就更多了。谢本书虽于63岁之年退休，而精力充沛，著书不已，希望他在未来的岁月中，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西南和云南近现代史作出更多的贡献。是为序。

马 曜

2001年2月6日

目录

序 / 马 曜

改革历史研究的途径 / 1

论历史认识 / 13

历史需要不断地重写 / 27

“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 / 30

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 50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论 / 65

论汉族的民族精神 / 78

百年来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启示 / 88

近代时期西南地区近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 / 98

云南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特点 / 108

论护国运动 / 126

西南军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 142

目录

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 / 168

——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

中国远征军的远征与滇西抗战 / 188

孙中山与云南 / 212

论蔡锷 / 226

蔡锷与民初政局 / 250

论唐继尧 / 263

论龙云 / 293

论张冲 / 311

论艾思奇 / 326

走自己的路 / 336

教师的追求 / 364

附 录 作者著作目录 / 369

后 记 / 373

改革历史研究的途径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祖国，在改革中前进，在改革中腾飞。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规定，“七五”计划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经济建设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建设也不应该例外。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科学来说，其发展也离不开改革。

建国以来，历史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历史，搜集发掘整理了大量资料。据统计，仅在“文革”前，已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种，字数就在两千万以上；经过初步整理的民族调查资料达两亿多字。“文革”以后，打破了“禁区”，资料的整理和大量档案史料的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可靠的原始材料。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突

破，例如历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出版了一系列中外通史及若干专题的专著。

尽管历史科学有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应当承认，它的发展仍然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不相适应的表现有许多方面，例如历史研究与实际脱离的倾向、历史学的自我封闭体系以及史学研究方法陈旧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历史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束缚，史学研究的业绩受到了影响，史学成果发挥影响的范围受到了局限。因此，有必要对历史研究本身进行改革，以促进新时期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研究改革的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一 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 改革历史研究的前提

史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关系，既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实际问题。作为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史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实际问题，也就是史学的研究要不要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在这里，涉及到史学的研究方向、历史学存在的价值等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进行改革的前提。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只要接触历史，历史的兴趣与现实的活动的活动，就像有座无形的天桥，自然而然地把它

们联接起来。而这种联系是相互的辩证的。因为，历史是与现实相对而言，是现实的过去；现实将转化为历史，是历史的现在。李大钊在《今》一文中说得好：“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①。”当然，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有区别的。但是，假若离开了现在，也就谈不到过去和未来。

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帮助的^②。”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在这一段话里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历史不等于现实，而现实却是历史的发展，研究历史是为了指导当前的运动。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国古代的学者早已提出。《诗经》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说^③，就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的意思。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④。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其目的在“治”与“鉴”上。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⑤。”王夫之进一步指出“资治”的含义：“曰‘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⑥。”梁启超更把《资治通鉴》看作是“皇帝的教科书”。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古人是说得明白的。

近年来，有人把历史作用于现实，归结为“四性”，即阐明

历史的规律性，预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的知识性，可以开拓人们的视野；历史的借鉴性，可以借前人得失鉴别自己的行为；历史的凝聚性，体现了民族的集体性，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归纳是有启发性的。

历史作用于现实是不应该有任何轻视的。列宁曾说：“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⑦”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⑧。”列宁把历史知识看作是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把历史知识看作是指导革命胜利的必备条件之一。我党在向全党发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号召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革命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并把这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为适应现实人们的需要，应该不断地研究和重写。意大利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力图使自己变完善，就是说，它在丰富着自己和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⑨。”历史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断地进行重写的现象，已为史学的发展所证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⑩。”这就是说，“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那总是从后面，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⑪。”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现实的东西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会更深一步，或者说需要重新认识历史。

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既然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求历史的研究紧密地考虑现实的需要。那种主张“为历史而历史”的陈旧观念是不足取的；有意回避现实向我们提出的研究课题，而津津乐道于象牙之塔，也是不能提倡的。历史研究的改革应当从这里开始。当然，这不是说史学不应该从事基础理论或基础史学的研究，恰巧相反，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任何基础理论和基础史学的研究，都应该服务于一定的对象。我们承认，历史学所产生的成果是精神产品、精神财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文化教养的提高，一般来说，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尽管如此，服务的对象仍然是明确的，不可否认的。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在促使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上迈出了一大步，甚至直接卷入了现实发展战略的研究，为现实的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数据，使历史学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赋予史学的发展以新的生命力。

二 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改革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方法论的问题是历史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缺乏正确的方法，或者在新形势下不能改进史学研究的方法，那么，历史研究工作者面对着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错综复杂、包罗万象的历史现象，将一筹莫展，既无从找到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无从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更无法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法论作为人类思维规律的形式，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历史研究的问题。阐明唯物

辩证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有关问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人类历史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⑫。”马克思主义向研究者提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并非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唯物辩证法就是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性的方法。所以，恩格斯又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⑬。”

不过，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层次。一方面，思维的方式，辩证的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方法论的原则不能成为走在历史研究前面的模式，因为“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⑭。”另一方面，方法论本身既有带根本性的指导方法，亦有在根本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只是为各门学科提出了总的思维方法，它不能代替各门学科的具体思维形式。因此，我们应当用一般思维方法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般思维方法去代替具体分析。同时，还要说明，“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像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像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⑮。”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在永恒地运动着的，而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意识或原则一经形成，就成为相对稳定和静止的东西。因此，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就会经常发生。既然原则来自实践，那么原则已被实践的发展抛在后面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实践的新发现去修改

原则而不是拘守原则。思维方式本身同任何事物一样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说，辩证的思维方式自身不能发展，那么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人类在前进，科学在进步，事物在变化，历史科学不是停滞的科学，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不应该是永恒不变的方法。对于已经过时的或陈旧的研究方法应当加以改革，对于传统的有用的方法也需要注进新的血液。

如何改革研究方法，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第一，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通用的研究方法问题。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这并不能说，二者之间不存在有共同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各自的研究方法向对方渗透的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有了伟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横断科学与边缘科学一个接着一个地兴起，使现代科学在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基础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化趋势。这种整体化不仅表现出以一门学科的方法研究另一门学科的边缘科学，如生物化学、地质力学等；也出现了各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中某一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还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

于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提炼出的一些普遍适用的方法，也可以考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例如控制论，这是一门研究有组织事物的联系、通讯和控制的科学，其基本概念是信息和反馈，其主要方法是信息方法和功能模拟方法。控制论的理论及其使用的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领域。控制论的行为分析法，在分析各种社会制度时，可以专门对各种社会制度进行功能比较，从行为功能的差别研究各种社会制度内部结构差别，有可能使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历史。控制论要求达到最优化的概念，从而有一个设计最优化控制结构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

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就是在一个社会内部，运用控制论进行研究，也可以有助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尽管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是否适宜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然而，它不妨碍人们进行探索。

第二，关于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问题。

微观与宏观这两个词汇及其反映的研究方法，首先开始于自然科学，然后运用于社会科学。

其实，应当说历史学从其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只不过人们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微观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历史的、局部的、细微的部分进行细致准确的考察，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种考察，历史研究就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这就是说，微观的研究为宏观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石。但是，如果只有微观的研究而没有宏观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不可能从总体上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微观研究要借助于宏观研究的提炼和指导。

当然，微观与宏观，这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讲。例如，一个县对于一个省来说，是局部的微观的；一个省对于一个县来说，则是整体的宏观的。而一个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局部的微观的；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省来说，又是整体的宏观的。这是从地区跨度来讲的。如果从时间跨度来讲，一个王朝对于古代历史来讲，是微观的局部的；而古代历史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则是宏观的整体的。同样，对于一个社会制度，比方说封建社会，较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微观的局部的；反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宏观的整体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历史学获得了新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宏观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